

# 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 外交政策理论<sup>\*</sup>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与经验拓展

陈志瑞 刘 丰

**【内容提要】**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一种试图将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两个层次的因素结合起来解释国家对外战略和行为的外交政策理论。在过去十多年间,这一理论催生了大量具有明确理论自觉性和鲜明问题意识的经验研究成果。与第一代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相比,第二代研究成果在理论上侧重于理论运用而非理论建构,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经验实证研究,尤其侧重通过对多个历史案例的比较以及单个案例内部的过程追踪对这一理论衍生的具体命题加以检验。这些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坚持以具体问题而非理论为导向的路径,围绕某种特定的对外战略和国家行为展开深入探讨,从而推进了外交政策研究的理论化水平。当然,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内部一致性、理论逻辑的严密性和研究方法的精密性等方面仍然存在局限。为了继续完善和改进这一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者需要在国内政治的核心变量上凝聚共识,同时在解释具体问题时完善因果分析的链条,从而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跨层次理论。

**【关键词】** 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分析;层次分析;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纲领

**【作者简介】** 陈志瑞,外交学院教授、《外交评论》执行主编(北京 邮编:100037);刘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天津 邮编:300071)

**【中图分类号】** D80 D8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  
(2014)03-0111-18

<sup>\*</sup>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外交政策理论的新发展”(12YJAGJW002)的成果。笔者对《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当然,文中的疏漏之处应由笔者自负。

## 一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与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等学派展开外部论战的同时,现实主义这一理论传统内部也发生分化,结合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要素的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独树一帜,成为现实主义理论内部最为活跃的分支。在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C. Wohlforth)、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等一批中生代现实主义学者所做研究的基础之上,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全球学术圈吸引了一批学者围绕其核心命题展开研究,产生了丰富的经验研究成果,从而发展成为一种得到广泛认可和普遍运用的研究路径。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特色和学术影响也引起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过去十多年间,一些关注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中国学者撰文对这一新兴理论加以引介评述。不过,从目前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看,中文学界产生的多数成果在对这一研究路径进行评述时,主要侧重于理论逻辑和研究方法的总结及其与其他现实主义理论分支之间关系的梳理。对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一理论分支的具体运用和实证研究明显滞后。<sup>①</sup>

为了更加清晰地认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学术立场、发展脉络,我们有必要考察学术界围绕这一理论产生的具体的经验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新涌现的一批代表性著作,从而更准确地理解这一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更深入的经验研究、批评和修正。众所周知,“新古典现实主义”得名于1998年吉登·罗斯(Gideon Rose)在《世界政治》杂志发表的一篇书评文章。在这篇书评中,罗斯详细评述了扎卡里亚、施韦勒、柯庆生、沃尔福思等学者的四部专著和迈克尔·布朗(Michael E. Brown)主编的一部文集。<sup>②</sup>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著作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为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一独特研究路径奠定基础、开辟道路的代表性论著。而在罗斯的评论文章发表之后的15年间,新古典现实主义在第一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又做出了许多新的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本文试图评估罗斯书评文章发表之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进展,在此笔者也选取了最近几年具有代表性的五部著作,分别是斯蒂芬·洛贝尔(Steven E. Lo-

<sup>①</sup> 徐其森、王英:《国内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综述》,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9期,第56-62页;于铁军:《新古典现实主义及其他》,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3期,第23页。

<sup>②</sup>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p. 144-177.

bell)、杰弗里·托利弗(Jeffrey W. Taliaferro)、兰德尔·施韦勒、科林·迪克(Colin Dueck)等人的四部专著和斯蒂芬·洛贝尔等主编的一部文集。<sup>①</sup>

## 二 新古典现实主义兴起的背景及主张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兴起的一种外交政策理论。当时,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层次,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理论分别上升到体系层次,形成了简约而科学的宏理论。反观外交政策理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比较滞后的领域。虽然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开创的“比较外交政策分析”曾风靡一时,<sup>②</sup>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外交决策三模型”也广为人知,<sup>③</sup>但是外交政策分析领域难改一盘散沙、缺乏普遍性理论框架的状况。<sup>④</sup>

明确区分国际政治理论与外交政策理论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进行理论建构的前提。他指出,只有当不同的对象与过程、行动与事件、行为与互动构成一个就其本身而言能够加以研究的领域时,理论建构才成为可能。理论将一个领域从所有其他领域中分离出来,为的是从学术上对其加以研究。分离一个领域,是建立一种解释其内部运行的理论的前提条件。<sup>⑤</sup>在他看来,国际政治理论试图解释国际体系中那些持久的、反复出现的模式,而外交政策理论研究的是个别国家的具体行为及其

① Steven E. Lobell, *The Challenge of Hegemony: Grand Strategy, Trade, and Domestic Poli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Colin Dueck, *Reluctant Crusaders: Power, Culture, 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一阶段新古典现实主义著述大量涌现,我们在此无法将所有重要论著都囊括在内,这里的选择体现了作者的研究兴趣和偏好,难免会有所遗漏。文中相应部分也会简要论及未能详细考察的一些著述,力图反映这一研究路径发展的全貌。

② James N. Rosenau, ed., *Comparing Foreign Policies: Theories, Findings and Methods*, New York: Halsted Press, 1974.

③ Graham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④ 有关外交政策分析这一领域总体发展状况的评介可参见 Valerie Hudson and Christopher Vor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39, No. 2, 1995, pp. 209–238; Walter Carlsnaes, “Foreign Policy,”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31–349.

⑤ Kenneth N.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 1990, p. 23, p. 26.

差异。<sup>①</sup> 他也明确指出,新现实主义不是一种外交政策理论,它所解释的对象是不同国家在体系中的位置大致相当时为何具有彼此相似的行为,以及由此反复出现的国际结果(诸如战争和均势),而对外政策中所涉及的变量相当繁杂,尤其要纳入许多单元层次上的变量,因此对外政策的理论化相当困难。<sup>②</sup> 外交政策理论化的难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人们研究对外政策时总是集中在某个具体的政策过程和结果,这使得研究中的因变量是情势性的,一般只能进行个案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影响对外政策的诸多因素涉及不同的分析层次,理论不能是各种事实和要素的罗列,需要考虑多种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且将它们有机地整合到一个因果机制中。尽管存在着理论化的难题,但国际关系中的不同层面都可能进行不同程度的理论化,因为其中总是具有可以发掘的规律性。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某个时期也会呈现出一定的模式,可以进行一般性的概括和描述,在此基础上做出的解释也可以形成理论。

华尔兹关于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的区分主要依据两者所要解释对象(因变量)的不同。尽管无论在现实主义阵营内部还是外部,也有学者并不赞同这种划分,<sup>③</sup>但是相当一部分现实主义学者将自己的研究限定为外交政策理论的构建与应用。比如,扎卡里亚认为,国际政治理论解释一般性的国际结果,而对外政策理论研究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所具有的不同意图、目标和偏好。<sup>④</sup> 托利弗也指出,“新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彼此之间就所要解释的现象(因变量)而言存在不同……大多数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并没有主张要解释体系结果”。<sup>⑤</sup>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华尔兹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限定为一种国际政治理论,才激发了现实主义阵营内部的一些学者试图建立更加简约、严谨和科学的外交政策理论。

如果说华尔兹对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两个领域的划分对于明确理论的范围有相当的合理性,那么他关于国际政治理论必定在体系层次、外交政策理论必定在单元层次进行构建的主张则引发了更多的批评和反思。上文已经指出,两种理论的区别在于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1979, p. 72.

②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1996, pp. 54-57.

③ Randall L. Schweller,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pp. 311-348; James D. Fearon,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1998, pp. 289-313.

④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14.

⑤ Jeffrey W. Taliaferro,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2006, p. 481.

解释对象的不同,而不是解释变量(自变量)的不同。尽管“国际政治不是外交政策”,但并不意味着体系层次变量不能纳入外交政策理论的构建。<sup>①</sup>因此,一种好的外交政策理论不仅需要将国家或国内政治“找回来”,<sup>②</sup>还需要寻求不同层次变量之间的联系,进行跨层次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产生了一些试图架构体系与国家这两个层次的研究成果。不过,正如彼得·古雷维奇(Peter Gourevitch)所指出的,“我们已经建立了将体系或者国家视为常量的强有力的研究传统。但我们没有太好的理论来应付二者都发挥作用、彼此相互影响的情况”。<sup>③</sup>

因此,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分野以及跨层次研究的兴起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兴起的重要理论背景。一方面,传统上有关对外政策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国内政治层面;另一方面,立足于体系层次的结构现实主义反对将其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理论。但是,一个国家实际的对外政策不可能将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上的影响因素完全割裂开来,架构起二者之间的联系、将其统一到对外政策的解释中就成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议题。

“新古典现实主义”得名于吉登·罗斯对扎卡里亚、施韦勒、柯庆生、沃尔福思等现实主义中生代学者研究路径的概括。扎卡里亚提出了解释大国崛起和扩张的“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理论,利用美国在1865-1889年和1889-1908年两个时间段里对外扩张政治利益的程度和国内政府力量变化的案例,对政府结构会限制国家力量的可使用程度的论断进行了检验。<sup>④</sup>施韦勒考察了二战期间欧洲主要大国对希特勒德国的绥靖政策,认为这一时期追随成为体系中的主导行为是体系和单元两个层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从体系层面看,当时是一种三极体系(美国、苏联和德国),而从国家层面看,有野心的修正主义国家试图追随更强大的修正主义国家以获取利益。<sup>⑤</sup>柯庆生提出了一种“双层次”国内动员模型,来解释冷战高潮时期中美之间的敌对,领导人如何利用低水平冲突动员大众,以此支持国家的长期安全战略。<sup>⑥</sup>沃尔福思则考察了冷战

① Colin Elman, “Why Not a Neorealist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1996, pp. 34-37.

② John M. Hobso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Kicking the State back out’: Reconstructing the Identity of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7, No. 4, 2002, pp. 437-444; Helen V. Milner, “Rationalizing Politics: The Emerging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 America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 785.

③ Peter Gourevitch,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321.

④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1998.

⑤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for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⑥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时期美苏对峙下双方关系的变化,认为在这些变化过程中,两个国家的决策者对相对实力的细微变化的敏感认识影响了这一时期美苏关系的每一次调整变动。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跌宕起伏并不完全是由两极体系决定的,也取决于美苏双方对各自拥有的实力和影响的判断以及相互之间的威胁认知。<sup>①</sup>

在梳理这些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罗斯指出了这些研究表现出的几点共性:(1)试图解释具体的外交政策行为而不是宏观的国际政治现象;(2)将国际体系视为导致任何一个国家外交政策行为发生变化的最重要的深层原因;(3)将国内层次因素纳入解释模型中,以增强经验上的准确性。<sup>②</sup>总的说来,这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一种好的外交政策理论需要将体系层次诱因与单元层次要素结合起来,体系诱因和单元要素在对外政策结果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如果将体系诱因作为对外政策的自变量,单元要素就是连接二者的干预变量,可能加强也可能减弱体系诱因对单元行为的影响。罗斯的述评文章反映了第一代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的基本面貌,更确切地说,这些研究展现了一种新的分析路径的雏形。相对而言,这一理论的逻辑是简单明确的,其特色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即利用历史案例来进行理论模型的检验。而最近十多年的主要研究,一方面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推理做了细化,另一方面则扩展了经验检验的领域。

### 三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经验拓展

在吉登·罗斯的述评文章发表之后,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一独特的理论路径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越来越多从事外交政策分析的中青年学者也倾向于将自己的研究归入到这一阵营之中,由此产生了一大批研究。在此,为了展示第二代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特点及其发展,笔者选择了四部专著和一部文集进行简要梳理:斯蒂芬·洛贝尔的《霸权的挑战》关注了霸权国在衰落时期的政治经济选择,杰弗里·托利弗的《平衡风险》解释了大国在边缘地区的干涉行为,兰德尔·施韦勒的《没有应答的威胁》对传统均势理论未能预测的制衡不足现象做了解释,科林·迪克的《不情愿的十字军战士》聚焦于美国大战略中的不一致,而洛贝尔等人合编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家与外交政策》对这一理论的优劣得失进行了阶段性反思,也廓清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此

<sup>①</sup>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sup>②</sup>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p. 148.

外,新古典现实主义阵营还产生了不少受到学界好评和关注的著作,<sup>①</sup>但考虑到上述著作的作者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学术成果较为丰硕,在学界的影响力也在显现之中,因此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 (一) 洛贝尔:霸权衰落的政治经济分析<sup>②</sup>

霸权兴衰历来是国际政治理论探讨的重要议题,霸权更替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都从体系层次讨论了霸权国衰落和挑战国的兴起对战争与和平造成的影响。<sup>③</sup>不过,对于衰落中的霸权如何进行战略谋划,以缓解其衰落的程度,或者适应挑战国的要求,既有理论的系统性讨论并不多见。为了解释霸权国在衰落时期的政治经济选择,洛贝尔建立了一个“颠倒的第二意象+第二意象(second image reversed plus second image)”<sup>④</sup>的理论框架,首先讨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对霸权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进而讨论霸权国国内政治对其国际行为的影响。

洛贝尔认为,崛起国采取改变现状的经济战略,会影响衰落中的霸权国的国内政治联盟的形态和力量。挑战现状的自由主义国家会增强霸权国国内自由国际主义政治联盟的力量,它们倾向于奉行合作战略。因此,面对自由主义的挑战国,霸权国更有可能放弃对争议地区的控制,通过削减国防开支、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就军备限制协定进行谈判、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方式加以应对。相反,如果对现状发起挑战的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霸权国内部经济民族主义政治联盟的力量会得到强化,它们会推动霸权国采取惩罚战略,在各个地区抵制挑战国。为了验证其理论逻辑,洛贝尔检验了三个霸权衰落的案例:一战之前的英国(1889-1912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1932-1939年)、腓力四世治下的西班牙(1621-1640年)。

洛贝尔也分析了为何一些霸权国能够应付衰落,维持其大国地位,而另一些霸权

① 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著作包括:Jason W. Davidson, *The Origins of Revisionist and Status Quo Stat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Mark R. Brawley, *Political Economy and Grand Strategy: A Neoclassical Realist View*,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He Kai and Feng Huiyun, *Prospect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the Asia Pacific: Rational Leaders and Risky Behavior*,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② 这里借用了诺林·里普斯曼对这本书的书评文章的标题。参见Norrin M. Rips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gemonic Declin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1, 2004, pp. 133-135。

③ 霸权更替理论的经典阐述见Robert Gilpin,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 1988, pp. 591-613;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权力转移理论的代表性论著是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④ “颠倒的第二意象”来源于彼得·格雷维奇在1978年发表的《颠倒的第二意象: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一文,参见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1978, pp. 881-912。

国衰败下去并退出大国行列。他的观点是,对霸权国的关键挑战是在经济与安全两种利益之间保持平衡。仅仅追求经济利益会导致它们对军事挑战应付不足,而仅仅追求安全利益从长期来看会损害为安全提供保障的经济基础。不过,对于一些国家而言,国际环境让它们无法在二者之间实现有效平衡。如果一个挑战国推行帝国主义的商业政策,霸权国采取合作的战略会立即失败,而采取惩罚战略会导致最终的衰落。只有当面对一些自由主义挑战国时,衰落中的霸权才有机会通过接纳自由主义的竞争者和收缩自己的势力范围来保持其大国地位。

## (二) 托利弗:大国干预的风险平衡理论

托利弗的研究考察了大国经常在并不涉及核心安全利益的边缘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和外交干预的原因。托利弗具体讨论了两个问题:其一,大国为何在边缘地区做出有风险的外交或军事承诺?其二,大国为何在胜利希望渺茫且政治、军事和经济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仍然维持在边远地区的冲突?通过借鉴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托利弗提出了所谓的“风险平衡论(balance-of-risk theory)”。

具体而言,托利弗从国家领导人对风险和收益的认知角度,解释了大国所采取的风险很大但成功机会并不明显的干预行为,认为国家会采取规避风险和接受风险两种不同策略,在预期自己处于获益状态时更倾向于前者,在预期自己处于损失状态时,更倾向于后者。对于托利弗而言,避免物质权力、地位或声誉等受损,“比在这些方面获利的前景在领导人的考量中所占的分量更重”。<sup>①</sup>具体而言,托利弗研究的自变量是领导人对国家实力、声誉和地位变化的预期,干预变量是领导人决策选择的期望值(决策参考点),因变量是领导人的风险倾向。其因果链条有两种情况:(1)领导人预期国家实力增强→以现状作为期望值→规避风险行为;(2)领导人预期国家实力减弱→以更有利的国际环境作为期望值→接受风险行为。

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假设,托利弗分别考察了三个主要案例:1905年威廉德国发起的摩洛哥危机、1940-1941年日本对美国的战争决策以及1950-1951年美国介入并且升级朝鲜战争的决策。由于这些案例都是进行冒险干预的行为,托利弗还选择了三个寻求冲突降级或者避免干预的控制案例,包括1911年德国发起的阿加迪尔危机、1938年和1939年日本试图防止与苏联之间的冲突升级以及1951年美国决定寻求谈判结束朝鲜战争。

## (三) 施韦勒:均势政治的国内制约

施韦勒对传统均势理论做出修正,他认为一国在应对外部威胁时至少有适当制衡、制衡过度、不制衡与制衡不足这四种行为模式,而非均势理论所强调的制衡行为为一

<sup>①</sup> 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p.4.

种。由于历史上大国在应对外部威胁时常常难以做出及时有效的制衡,他将研究问题设定为制衡不足这一现象为何在历史上会普遍存在。

为了解释制衡不足,施韦勒从众多的国内政治因素中提取了四个影响国家行为的变量,分别是精英共识(elite consensus)、精英凝聚力(elite cohesion)、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以及政府/政权脆弱性(government/regime vulnerability)。作者认为,精英共识和精英凝聚力决定了国家行动的意愿,而社会凝聚力 and 政权脆弱性决定了国家行动的能力,这四个变量综合起来共同构成了国家的一致性(state coherence)。<sup>①</sup>不同变量对制衡不足现象的影响是有差异的,由于决策总是由政治领导层做出,政治精英的行动能力和意愿是国家策略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精英阶层就威胁性质、程度、应对策略等问题能否达成一致及其受到派系纷争和利益冲突等“内耗”影响的程度,直接决定了采取制衡行为以应对威胁的意愿。而政府的脆弱性和社会凝聚力则影响到精英通过国家机器汲取资源进行制衡的能力。由于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其不同组合所产生的影响有所差别,施韦勒在其研究中将四个变量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组合,构建了产生制衡不足行为的五种因果图式,明确了其中因果链条上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

在提出理论假说并且明了其中的因果链条的基础上,施韦勒选取了两组案例对其理论阐述加以历史验证:第一组案例涉及大国的战略行为,分别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对德国扩张的反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对德国的政策以及1877-1913年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对德政策这三个案例;另一组案例则考察了小国的战略行为,主要是1864-1870年三国同盟战争期间阿根廷和巴西应对巴拉圭的行为选择。

#### (四) 迪克:战略调整的战略文化解释

科林·迪克试图解释美国大战略的整体演变轨迹。在他看来,美国对国际挑战做出的战略调整,既不像结构现实主义主张的那样,可以完全从国际物质实力对比变化的角度理解,也不能像建构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可以单纯归结为美国的战略文化。相反,权力和文化对美国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做出战略调整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国际压力(比如美国国家安全遭遇严峻威胁)设定了美国大战略的总体背景,并且构成了战略调整的动力,美国战略文化通过其在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影响决定了特定调整的内容。

迪克将战略文化作为战略调整的关键中介变量,认为美国的政治传统中有两种经久不衰、一以贯之的战略文化,分别是自由主义和有限责任。根据政策精英对两种文化坚持的强弱可以形成四种战略子文化,分别是国际主义、民族主义、进步主义和现实

<sup>①</sup>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47.

主义。<sup>①</sup>美国的战略调整主要取决于哪一种战略文化能够对政策精英的行为发挥首要影响,而这又是由国际条件、主导性战略文化、国内政治以及政治领导人这四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sup>②</sup>

迪克也指出,美国的战略文化不会自动转化为国家的大战略选择。实际上,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导人任内,美国积极推行自由主义的力度和卷入国际体系的程度有强弱之分。为了验证他的假设,迪克选择了美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三个历史时刻,对当时的美国战略选择进行了深入的案例研究。这三个案例分别是:(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拒绝参加国际联盟(1918-1921年);(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鲁门政府采取遏制战略(1945-1951年);(3)冷战结束后美国试图以较低代价维持霸权(1990-2000年)。总体上看,迪克认为,由于美国的战略文化对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目标的设定,加上国际压力的作用,导致美国的政策在不同的方向上摇摆。目标设定与成本和风险之间的脱节常常造成美国大战略中的自相矛盾和事与愿违。

#### (五)洛贝尔等:盘点新古典现实主义<sup>③</sup>

2009年,斯蒂芬·洛贝尔、诺林·里普斯曼(Norrin M. Ripsman)、杰弗里·托利弗等一批新古典现实主义阵营的新生代学者主编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家与外交政策》一书,在其中汇集了主要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的最新研究,试图对这一理论的核心主张进行系统阐述和评估,并且为这一研究路径的发展廓清方向。为了明确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其他现实主义分支的区别,也为了回应一些学者提出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背离了现实主义核心逻辑的批评,文集的编者试图用“国家(state)”这一概念来统合新古典现实主义,确立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同时又区别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国家观。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内部特征会影响领导人对国际威胁和机遇的评估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外交、军事和对外经济政策。这些内部特征主要包括政治、军事机构的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国内社会中的行为体和利益集团的影响,精英或社会的凝聚力等。<sup>④</sup>但是,单纯强调国家内部特征并非这一理论的要旨,在几位编者看来,这一理论对国家的认识既不同于结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相

① Colin Dueck, *Reluctant Crusaders: Power, Culture, 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p.21-31.

② Colin Dueck, *Reluctant Crusaders: Power, Culture, 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p.33-37.

③ 这里借用了唐世平的书评文章的标题。参见 Shiping Tang, "Taking Stock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1, No.4, 2009, pp.798-803.

④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p.4.

同的是,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为重要的行为体,但与之不同的是,这一理论认为国家内部是存在差异的,并非铁板一块。与此同时,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将国家当做不同集团或阶级经济利益的汇合不同,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因为负责制定对外安全政策的政府首脑、部长和其他官员构成了所谓的“国家安全执行官(national security executive)”,他们在国际和国内的双重约束下界定“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政策。<sup>①</sup>

在做出理论归纳的同时,文集从三个方面限定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议题:威胁评估、政策调整和资源汲取。这三个领域分别涉及哪些国内政治因素确定一个国家处于威胁之中以及威胁程度的大小,哪些因素在应对威胁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哪些因素影响政策的实际执行及其效果。应该说,这本著作对过去十多年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做了盘点,也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具有阶段性总结的意义。

出于讨论的便利,笔者将罗斯述评文章发表后出现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成果称为第二代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与第一代研究更多是一种不约而同的学术默契或不自觉的殊途同归相比,第二代研究有了更明确的理论取向和自觉性,上述大部分学者在著述中明确地将自己的研究归入新古典现实主义阵营。与此同时,这些研究也使得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定位更加明晰和确定。这主要表现在理论类型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

就理论类型而言,上述研究明确将新古典现实主义定位为一种外交政策而非国际政治理论,甚至更明确地说,是一种理论运用而非理论建构。这种理论取向强调的是在对具体议题的研究中构建或运用中层理论,而不是进行抽象的宏理论构建。

通过对上述著作的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学者并不试图做出明确的理论建构。尽管他们的著作中有专门阐述理论架构的章节,但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由吉登·罗斯在其书评中所设定的分析框架,著者的工作是对这一框架做一些修正和补充,使其与著者所要分析和解释的具体问题相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第二代研究并不具有太强的理论创造性,甚至表现出一种对宏理论建构的拒斥倾向。当然,这些研究也体现出一定的理论创新,主要是增加、整合或修改以往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核心概念或变量,或者借鉴其他学科或分支领域的理论,比如洛贝尔借鉴并修正了“颠倒的第二层次意象”这一概念,托利弗从心理学的前景理论中借鉴了“风险”这一概念。由于大部分研究者聚焦于理论应用而非理论建构,不同于范式间辩论所立足的抽象层次,现实主义内部的辩论在更为具体的经验层面展开。

<sup>①</sup>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p. 25.

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生产大致可以区分为宏理论、问题导向的理论、案例导向的解释以及政策制定等几类。<sup>①</sup>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基本介于问题导向的理论以及案例导向的解释之间。比如,托利弗、施韦勒关于大国干涉的理论和制衡不足的理论。当然,即便理论运用是以具体议题和问题为依托的,这些学者的研究也仍然强调一般性解释而非特例式解释。具体而言,大部分学者所研究的问题是具有相对普遍性的对外政策行为,比如改变现状/维持现状、大国干涉、制衡不足等都不是一个国家所特有的,而是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经常采取的、可以找到一定的模式或规则的行为取向。在一定程度上,第二代研究回应了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较早之前对这一理论的批评。沃尔特指出,由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回避了仅仅关注国内或体系变量的单因素分析,它更适合于在历史叙事中建构理论;其精于历史细节的描述,主要着眼于对单个国家或个别现象的历史事例进行解释,缺乏一般性推理。<sup>②</sup> 从洛贝尔、托利弗和施韦勒的研究看,他们所研究的问题都不只是针对特定案例或单个国家,解释对象具有一般性。

从研究方法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强调经验实证研究,尤其是通过多个历史案例的比较以及单个案例内部的过程追踪对其理论命题加以检验,由此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历史研究方法结合起来。

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界,长期以来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的争论和对立,主张实证方法的一派占据着绝对主导,尤其表现在主流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的方法论倾向上。不过,即便是在坚持实证方法的学者中,在对不同的研究技术和技巧的强调方面也存在着巨大分歧,统计分析、形式建模和案例研究这三种不同的方法都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不过,以统计分析和形式建模为主的“硬科学”方法占据着绝对主导,支持这些方法的学者对于依赖历史资料和事实的案例研究方法多有批评。比如,齐夫·毛兹(Zeev Maoz)认为,“案例研究在很多情况下成了怎么都行的随意研究的代名词,作者感到自己无须阐明如何进行研究,为何选择一个特定案例或一组案例,哪些案例数据被使用了,哪些被省略了,如何处理和分析数据以及推论是如何从作者呈现的故事中产生的”。<sup>③</sup> 当然,坚持定性分析的学者也对数理模型在政治学

① Joseph Lepgold, “Is Anyone Liste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Policy Relevanc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3, No. 1, 1998, pp. 43-62.

② Stephen M. Walt,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the Realist Tradition,”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II*, New York: W. W. Norton, 2002, p. 221.

③ Zeev Maoz, “Case Study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From Storytelling to Hypothesis Testing,” in Frank P. Harvey and Michael Brecher, eds., *Evaluating Methodolog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p. 164-165.

和国际关系研究期刊上占据主导表达了不满,斯蒂芬·沃尔特就批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只是在重复一些近乎于常识的论断。<sup>①</sup>

抛开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优劣不谈,最近十几年间,主要依靠历史案例分析的定性分析方法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这一研究技巧日益精细,在案例选择和检验等方面的标准也愈发严格。第二代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定性研究方法的新发展,越来越多地依靠较为严格的案例研究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这意味着,这些研究在假设检验和案例选择等方面既要满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要求,同时在历史资料的选用和处理方面也要像历史学家一样严谨和精细,不能停留于对历史事实的粗略描绘和裁剪。比如,托利弗在论述一战和二战期间的大国干涉案例时主要依靠的是高层会议、私人通信、政府内部文件、情报报告和外交电报等一手资料,施韦勒利用了相关国家的历史档案、外交人物的传记和文献以及相关的历史事实来判断他所设定的四个国内政治变量的变化。

与第一代研究相比,第二代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更加广泛,讨论的案例更加多样,研究的过程也更为细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界的辩论过于关注宏理论层面的概念问题,比如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制度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辩论,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关于规范与理性因素何者更加重要的论争。新古典现实主义没有局限于这些抽象理论问题的争论,而是走了一种折中道路,坚持以具体问题为导向而非理论为导向的路径,开拓了一些具体的经验研究,从而推进了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的理论化水平,这应该是第二代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所做的最大贡献。正如沃尔福思所评论的那样,新古典现实主义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现实主义理论分支,这一阵营的学者具有两项共性:一是关注具体问题或事件的解释,二是试图重新找到被新现实主义者遗失的重要洞见。<sup>②</sup>

#### 四 跨层次外交政策理论构建的缺失与前景

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归为新古典现实主义路径,这一理论的发展也出现了一定的困境和局限,主要表现在内部一致性、理论逻辑的严密性和研究方法的精密性等三个方面。

<sup>①</sup> Stephen Walt, "Rigor or Rigor Mortis? Rational Cho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p. 5-48.

<sup>②</sup> William C. Wohlforth, "Realism," p. 140.

第一,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目前已经建立了许多分析模型,但由于缺少一种统一的核心理论,其内部缺乏一致性。实际上,洛贝尔等人在盘点新古典现实主义时也承认,它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而是多种多样的理论。<sup>①</sup>

新古典现实主义缺乏内部一致性,突出表现在没有一个核心概念来统合不同学者的研究议程。众所周知,几大宏理论和主要中层理论都有着较为明确的核心概念,其支持者围绕着某一核心概念展开因果推理,构筑理论内核,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纲领。比如,在现实主义阵营中,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分别是利益和结构;在自由主义阵营中,商业自由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共和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分别是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和民主政体。但是,考察上文提到的一些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性研究可以发现,不同著者在其论述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都不尽一致,这些单元层次的变量包括领导人对力量对比的认知(沃尔福思)、动员能力(柯庆生、扎卡里亚)、国家的利益偏好(施韦勒)、领导人对国家自主性的认知(斯特林-福科尔)、行政部门的自主性(里普斯曼)、国内集团力量对比(洛贝尔)、领导人对风险和收益的认知(托利弗)、国家凝聚力(施韦勒)、战略文化(迪克)等。从广义上讲,这些变量可以被归为物质性因素和观念性因素这两大类别,具体而言则涉及国内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传统、领导人认知等不同类型的因素。缺乏核心概念无疑会损害研究纲领的一致性和凝聚力,也会成为其他理论质疑这种理论的焦点。

第二,从理论逻辑的严密性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对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变量之间关系的处理常常是矛盾的,还不是一种成功的跨层次理论。

自肯尼思·华尔兹开创结构现实主义之后,尽管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相继建立起体系层次的理论,但这种理论构建的路径仍然遭受诟病。显然,体系层次的宏理论在分析具体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时具有明显的缺陷:首先,由于体系层次的变量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幅度较小,变化速度较慢,在解释微观层次的变化时难免会出现解释力不足的情况。其次,体系理论忽视了行为体的多样性,假定行为体是功能相似的单元,这就难以解释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为何功能相似的国家的国际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再次,体系理论忽视了行为体的能动性,没有注意到单元的主动行为,尤其是核心大国的行为可能影响到结构的变迁。最后,冷战结束之后,体系结构的重压减轻,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力量得到释放,国家属性和国内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日益加强,同时全球化也使得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增强,体系理论将国际与

<sup>①</sup>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p. 10.

国内因素完全割裂开来的做法备受争议。

新古典现实主义将体系层次因素作为自变量,将单元层次因素作为干预变量,实际上也是一种跨层次理论的尝试。但是,根据上文介绍的几项研究可以看到,国际结构这一变量在这些研究中要么未加讨论,要么被当做背景性因素,比如施韦勒将一国面临的外部威胁当做体系层次因素,但他并未讨论外部威胁的增强和减弱如何影响一国的国内政治,而只是关注了一国面临较强的外部威胁时的情形。这种做法无疑将结构性因素当做了常量,仅仅讨论国内层次变量的变化,使得新古典现实主义更像是一种国内政治理论而非双层次或跨层次理论。此外,尽管或多或少都提及了结构性因素,但研究者们对这一因素的表述并不一致,沃尔福思、柯庆生、扎卡里亚等人考察的是力量对比,施韦勒、戴维森和迪克等人讨论的则是外部威胁。显然,正如斯蒂芬·沃尔特在其关于联盟形成的理论中所表明的,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对比并不是一国所面临的外部威胁的唯一决定因素。<sup>①</sup>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新古典现实主义高度依赖案例研究方法,大多利用历史事实对理论进行检验,但仍然有不少学者的研究缺乏对案例选择的明确说明,在研究过程中只选取了确证性案例,假设检验被简化为确认(confirmation)或说明(illustration)。

案例研究是一种在国际关系领域被广泛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通过案例之间的异同比较发现新的变量和假说,通过对案例内部的详细考察做到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的明晰。当然,这种方法也存在变量繁杂不易控制、案例选择欠缺随机性和代表性、缺乏推理的一般性而难以进行外部延展等缺陷。为了克服这一方法的缺陷,方法论研究者们提出了许多案例选择的技巧,以便尽可能地减弱选择偏差(selective bias)的影响。<sup>②</sup>一般而言,研究者在选择案例时应该避免按照因变量的取值选择完全符合理论预期的案例,如果这样选择,仅仅是对理论假设进行举例,而不是检验。<sup>③</sup>具体而言,案例内部或者是不同案例之间的因变量取值应该存在较大变化,以便确定自变量变化会导致因变量的相应变化。举例来说,当我们试图研究一项战略取得成功的条件时,既需要考虑被视为关键条件的因素在战略成功时的取值,也需要考虑在战略失败时的取值,如果无论战略成功与否,这些因素都没有变化或者变化幅度较小,就不是导致战略成功与否的主要影响因素。然而,许多新古典现实主义并未考虑因变量

①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② 比如,约翰·格林(John Gerring)提到了案例选择的九种方法。参见 John Gerring, *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5.

③ 一些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论著告诫我们不能依据因变量来选取案例。参见 Gary King, Robert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08; George and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79。不过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 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pp.46-47.

的充分变化,比如在施韦勒所选择的四个案例中,只有一个案例的某一阶段存在有效制衡,其他案例都只讨论了制衡不足的情形。当然,在托利弗的研究中,他既考察了干预发生的案例,也考察了没有干预的案例。

在主要依靠历史分析方法的同时,大部分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所讨论的历史经验相对而言比较狭隘,主要聚焦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及冷战时期的历史案例。尽管这几个时段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形成以及理论的发展,然而,无论是从研究结论的一般性还是视野的广泛性来看,任何理论都有必要扩展和补充其经验事实,将历史上其他地区性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行为以及冷战后时代的国家行为更多地纳入到研究中。当然,也有新古典现实主义阵营中的少数学者做出了这样的尝试,比如施韦勒所研究的拉美国际体系的案例,而一些学者在检验和修正均势理论的过程中也纳入了古代中国、印度和其他地区的案例。总体来看,一种强有力的理论需要拓展其时间和空间维度,解释更广泛的和普遍的经验事实。

综合以上几方面的缺陷,新古典现实主义更多地提供了一种解释问题的思路,而未能形成一种独立的研究纲领。<sup>①</sup> 尽管在分析国家的对外战略和行为时试图同时考虑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变量,但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并未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主要侧重于国内政治层次的分析,而且不同研究者纳入了过多的国内层次变量,使得这一研究路径内部缺乏凝聚力。针对上述缺陷,笔者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改进应从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条路径是加强理论层次的构建,从逻辑上理顺自变量(国际结构)与干预变量(国内变量)之间的关系,同时减少国内层次变量,在一两个核心变量上凝聚共识。

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的,新古典现实主义通常解释的是结构现实主义的异例,即不符合结构指令的行为。<sup>②</sup> 换言之,作为干预变量的单元层次要素常常起到的是抑制结构层次要素的作用。但是,从逻辑上分析,作为结构层次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干预变量,单元层次至少可以起到四种不同的作用:(1)加强结构指令;(2)传导结构指令;(3)抑制结构指令;(4)反转结构指令。在进行理论推导的过程中,新古典现实主义应该将这四种作用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不仅仅解释结构现实主义的反例。与此同时,新古典现实主义应该减少研究变量,在少数变量上凝聚共识,从而使这一理论获得广泛认同的基础。洛贝尔等人在主编文集时已经意识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阵营内部的松散性和不一致性,因此他们试图用“国家/政府”这一概念来统合既有研究,然而,作为一个与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参见刘丰、左希迎:《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第127-137页。

<sup>②</sup> Brian Rathbun,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 pp. 294-321.

“社会”相对的概念,“国家”仍然包含着政治体制、政府能力和领导人等众多维度,仍然难以作为一个有确定内核的概念。在理论构建过程中,新古典现实主义可以围绕政府能力等物质性变量展开,而将其他一些因素作为这一变量的操作化指标加以考虑。

第二条路径是在具体问题的解释上完善因果分析的链条,厘清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从而提供更完整和可信的解释。

当我们试图解释一国的外交战略和行为时,通常需要考虑三个问题:(1)哪些因素影响国家战略和行为?(2)这些因素分别对国家战略和行为产生何种作用以及作用力的大小如何?(3)如何将这些因素串联到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上?第三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不能提供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所做的解释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满意的解释需要研究者提供原因与结果之间相互作用过程的因果故事(即因果机制),在多变量的研究中尤其如此。<sup>①</sup> 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中,涉及国内与国际两个层次的多个变量,但是大部分研究者并没有将这些变量有机组合起来。施韦勒可能是一个例外,他将四种国内政治变量进行了不同的排列组合和串联,形成了五种不同的因果图式,不过他的因果图式既没有考虑体系层次因素的变化,也没有穷尽这四种国内政治变量的组合方式。实际上,制衡不足并不完全是国内动员能力不足的问题,某些结构性制约也会阻碍国家的制衡行为,比如实力差距以及结盟的可能性等。

明晰因果机制有助于改进新古典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路径可以概括为:国际诱因-国内政治-政策选择,在纳入国内政治变量后,现有的研究关注的是后一个因果链条:国内政治-政策选择,而没有完善前一个链条:国际诱因-国内政治。无疑,国家行为是结构制约与国内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对两方面的因果链条都加以完善,新古典现实主义才能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架构国际与国内因素的跨层次理论。

## 五 结论

与立足体系层次、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的结构现实主义相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将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结合起来,分析国家的内部结构如何对外在威胁和机遇进行过滤,国家领导人如何评估威胁、制定战略、动员社会资源以支持这些战略,从而建立一种解释国家行为的外交政策理论。这一理论保留了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要素,同

<sup>①</sup> 曲博:《因果机制与过程追踪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97-108页。有关因果机制定义的详尽讨论,可参见 James Mahoney, “Beyond Correlational Analysis: Recent Innov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 *Sociological Forum*, Vol. 16, No. 3, 2001, pp. 575-593; John Gerring, “Causal Mechanisms: Yes, Bu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3, No. 11, 2010, pp. 1499-1526。

时恢复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些洞见,从而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人们对结构现实主义不能解释对外政策行为或者忽视国内政治因素的抨击。

罗斯1998年发表的长文《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外交政策理论》对第一代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做了总体评估,这篇文章也激发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新古典现实主义阵营,表明了这一理论路径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催生了国际关系理论与对外政策分析的结合,在地区研究或国别研究领域产生了一些更具理论色彩的成果。<sup>①</sup> 新古典现实主义开辟了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不过无论是其理论逻辑与经验论证都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从理论上讲,新古典现实主义还不是一个统一的阵营,其内部的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国内层次变量,对于这些变量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所起的作用还缺乏共识;而在实证方面,当前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历史的个案分析,过分依赖于某个国家在某一个时期的对外行为和政策,缺乏一定的普遍性。只有在这两个方面取得进展,新古典现实主义才能成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性理论。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将新古典现实主义运用于对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的研究,但这些文献相对于这一理论在其他国家和议题上的运用而言还属于少数。<sup>②</sup>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我们需要更多地利用这一理论分析实际的对外政策,在具体问题的解释中修正和发展这一理论。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特色来看,其擅长于理论运用而非理论构建,因此其理论逻辑是相对容易掌握的。不过,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这一理论强调历史案例分析的方法,需要研究者对国际关系史的充分理解。这种理解并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粗线条认识,而且是对所研究的历史阶段和事件较为深入的理解以及对相关历史文献的充分掌握。这也要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将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及国际关系史三个领域的知识有机结合起来。

[收稿日期:2014-01-09]

[修回日期:2014-02-12]

[实习编辑:冷鸿基]

---

<sup>①</sup> Kai He, "Dynamic Balancing: China's Balancing Strategie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1949-200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No. 58, 2009, pp. 113-136; Hyon Joo Yoo, "Domestic Hurdles for System-Driven Behavior: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Missile Defense Policie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2, No. 2, 2012, pp. 317-348; Cheng-Chwee Kuik, "Malaysia's US Policy under Najib: Structural and Domestic Sources of a Small State's Strategy," *Asian Security*, Vol. 9, No. 3, 2013, pp. 143-164.

<sup>②</sup> 关于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的代表性研究可以参见:Kai He, "Dynamic Balancing: China's Balancing Strategie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1949-2005," pp. 113-136; Kai He and Huiyun Feng, *Prospect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the Asia Pacific: Rational Leaders and Risky Behavior*, 2013.